《近现代翻译文学文献目录汇编》序

□ 李金涛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翻译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国的翻译历史悠久，最早可上溯到周代。在近代之前，中国的翻译事业出现了两次高潮，即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1840 年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始设立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科学类图书。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倡将西学输入的重点转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大量关于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改革史、革命史的图书被译介过来，掀起了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在这次翻译高潮中，外国文学作品开始陆续进入中国。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外国文学的译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左联”是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也是翻译文学事业的中心。它团结了一切进步作家和文学翻译家，推动了翻译文学的发展[①]。在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大量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事业虽然受到了影响，但在反法西斯文学、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以及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方面仍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近现代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还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陈平原认为：“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②]贾植芳先生在《译介学》序言中说：“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③]

此外，清末民国时期是我国目录学从传统向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求，目录学家、作家、翻译家、藏书家、出版机构、书店及图书馆等编制了种类繁多的目录。其中收录有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目录不仅是重要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同时也是了解外国文学作品早期翻译传播以及研究翻译家生平著述的珍贵资料。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近现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现代时期编制的目录文献资料受到了各出版机构和学者的关注，在整理汇编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近代译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晚清新学书目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民国时期出版书目汇编》《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和《民国时期公藏书目汇

[①]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68 页。

[②]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4 页。

[③]贾植芳：《序一》，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

编》，凤凰出版社的《近代专题文献目录汇刊》等。这些目录的影印出版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然而，这些目录大多为综合性目录，收录的外国文学书目信息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分散在不同的书目汇编中，查找起来十分不便。此外，仍有大量近现代翻译文学专题目录尚未得到发掘利用，因此有继续整理的必要。

为了深化我国的外国文学、近现代文学和目录学研究，笔者拟将搜集到的收录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目录影印出版，汇编成七册，按照目录收录的内容将其分为外国文学专题目录、国别文学专题目录、个人译著目录，以及文学目录、馆藏目录、出版发行目录、译书目录中的翻译文学七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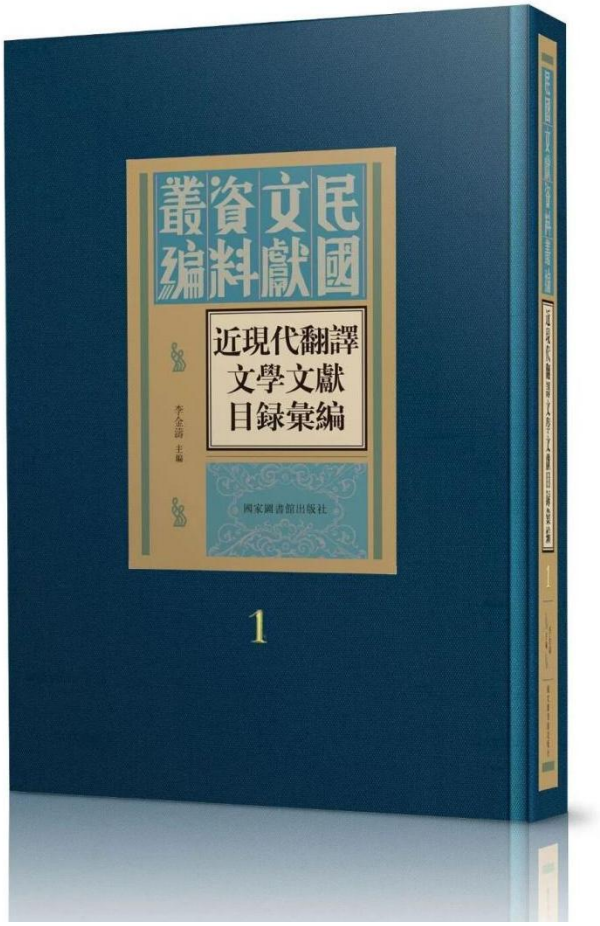

图 1　《近现代翻译文学文献目录汇编》

外国文学专题目录部分，按照编制时间顺序收录了樾荪编《汉译各国短篇小说集编目》，虚白编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Literature*（西洋文学的汉译）和《中国翻译欧美作品的成绩》，虚白原编、蒲梢修订《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第一回》，谭正璧编著《中国文学进化史》中的“各国文学的翻译本”，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的“各国文学书中译本一览”，茅盾著《汉译西洋文学名著》，李黎著《世界大文豪及其中译本》，宋春舫著《汉译欧美剧本的统计》，黄源编《一九三六年度的文艺译本》，田禽著《中国戏剧运动（新中国戏剧简评）》中的“戏剧翻译书目”。

国别文学专题目录部分，收录了西谛编《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赵景深编《俄国文学汉译编目》《汉译托尔斯泰著作编目》《契诃夫作品中译本编目补遗》、蒲梢编

《中译苏俄小说编目》、阿英编《中译高尔基作品编目——为哀悼高尔基逝世作》、葛一虹编《汉译苏联戏剧理论及旧俄作家与苏联作家之剧本编目》、戈宝权编《普希金作品中译本编目》等三十三种俄国文学专题目录；收录载于《北京近代科学馆馆刊》的《汉译日本艺文类书目》、苏象编《中译日本艺文书籍选书目》、谭仲玉编《汉译日本文学名著及其作者》、陈蘊山编《汉译日本文学作品编目》四种日本文学专题目录；收录《金沙》所载《雨果著作的中译本》、葆荃编《罗曼·罗兰著作中译本编目》、修文著《谈莫洛阿氏著作的中译本》三种法国文学专题目录和《政治月刊》（上海）缅怀泰戈尔逝世所辑《太氏著作中译》一种印度文学专题目录。在这些目录中有很多新发掘和新发现的史料，为研究外国文学的早期译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个人译著目录部分，收录了景宋编《鲁迅先生撰译书录》、鲁迅自编《鲁迅译著书目》、国华编《鲁迅先生著译及编校书目》、唐弢拟订《重订鲁迅译著书目》等十余种鲁迅著译目录，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筹备会编《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著译编目》、毅编《郭沫若先生著译书目——为郭先生五十华诞作》两种郭沫若译著目录和戈宝权编《耿济之先生所译俄国文学作品的初步编目》。

文学目录部分，收录了东海觉我编《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文学研究会编《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星海》（上）中蒲梢编《最近文艺出版物编目》、上海书报邮售社辑《上海书报邮售社分类书目第一种：新文学书目》、阿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中的“翻译编目”、舒畅编《现代戏剧图书目录》，还有 1932、1934 至 1936 年《中国文艺年鉴》刊载的文艺书目。

馆藏目录部分，收录了《涵芬楼新书分类总目》小说类下的“翻译之属”，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汉译西文书目索引》，以及《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申报流通图书馆图书目录汇编》《上海市图书馆图书杂志目录：第一辑》《上海市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二辑》《中国流通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新亚图书馆图书目录汇编》中的“文学”部分。

出版发行目录部分，收录了 1932 和 1933 年现代书局编《现代书局图书总目》的“文学类”、《邮局代购书籍目录：第一期》下册中的“文学”、北新书局编《北新书局图书目录（1935 年简本）》的“文学”、生活书店编《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的“文学”和《生活全国总书目》的“文艺”及后附《全国儿童少年书目》的“文艺类”、开明书店编《全国出版物总目录》的“文学类”和《开明书店分类书目》的“文学类”、杨家骆编《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中的“翻译文学”、商务印书馆编《图书汇报》新九号的“文学”、文化供应社编《全国新书目录》的“文学·艺术”、中华书局编《中华书局图书目录》重编第十三号的“文学”和“丛书”类中的文学部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部分馆藏目录和出版发行目录中的翻译文学并没有单独成类，且较为分散，为了尽可能展现外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翻译传播基本面貌以及翻译文学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本次影印了馆藏目录和出版发行目录的“文学类”或“文艺类”的全部内容，同时补充了目录中儿童读物部分的“文学”内容。为了方便读者查询利用，还影印了版权页、序言、凡例、分类纲目等内容。

译书目录部分，收录了欧特曼（Othmer）和魏以新编《中译德文书籍目录：第一次》、毕树棠编《汉译义国书籍及关于义国之汉籍目录》、傅吾康和张绍典编《德籍汉译存目》、日

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中译日文书目录》。上述四种译书目录系首次进行辑录，故此次影印其全部内容。此外，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和顾燮光辑《译书经眼录》是晚清著名的两部译书目录，在近年出版的《近代译书目》和《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中已有收录。因其收录的外国文学图书数量较少，故不再影印，但为了保证近现代翻译文学文献目录的完整性，本书仍摘录其收录的外国文学图书目录内容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近代翻译文学文献目录资料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望读者能够留意甄别。此外，受晚清民国时期印刷条件有限、时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保存下来的文献品相参差不齐，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出版物，个别存在页面缺损或文字漫漶不清等问题，虽尽力查找配补，并对页面进行了技术处理，但仍未尽完美，祈请读者谅解。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编纂整理过程中得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李强主任和郑小笛老师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本书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批评指正。